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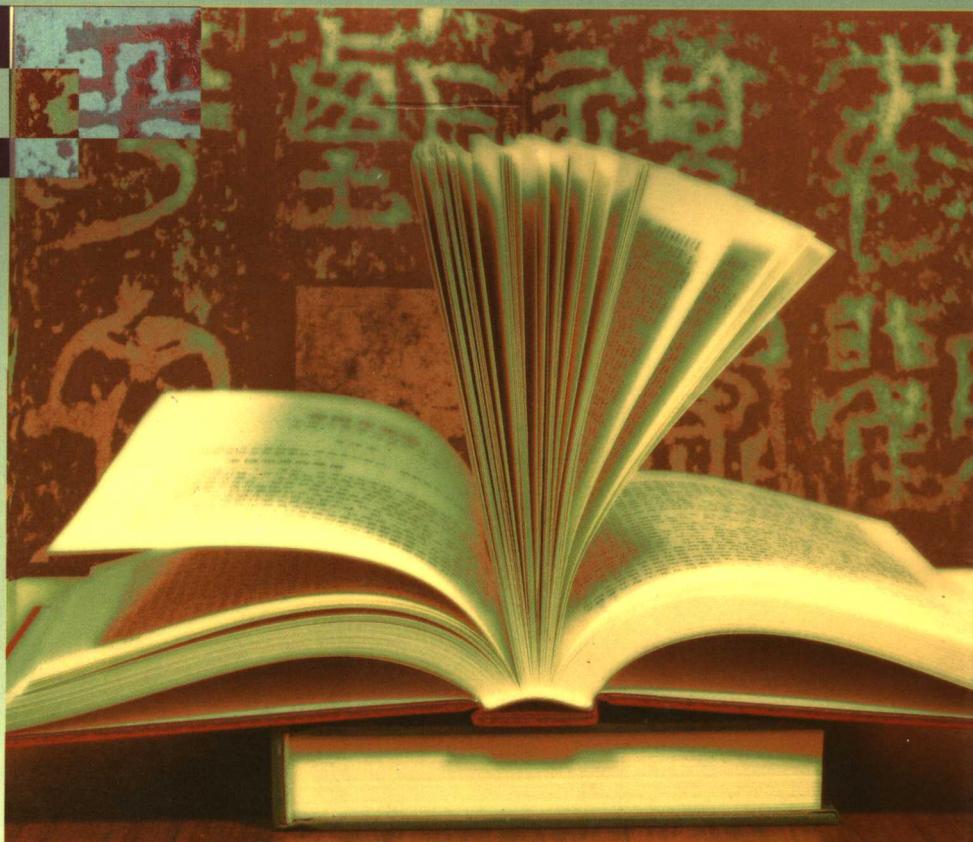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

H A N Y U T O N G L U N

汉 语 通 论

(第二版)

■ 齐沪扬 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

汉语通论

(第二版)

齐沪扬 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通论/齐沪扬主编. -2版.-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 2005.8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

ISBN 7-304-03380-0

I . 汉 … II . 齐 … III . 汉语—电视大学—教材 IV .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5)第096897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

汉 语 通 论

(第二版)

齐沪扬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

电话: 发行部: 010-68519502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 来继文

封面设计: 马增千

责任编辑: 王清珍

版式设计: 张利萍

印刷: 北京市银祥福利印刷厂 印数: 0001~11000

版本: 2005年8月第2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B5 印张: 30 插页: 1 字数: 540千字

书号: ISBN 7-304-03380-0/H·200

定价: 3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主编简介

齐沪扬，浙江天台人，1950年8月生于上海。博士学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华东修辞学会理事，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上海语文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汉语言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延边大学兼职教授。1982年起，长期在高校从事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中国语文》、《中国语言学报》、《语言文字应用》、《语法研究和探索》、《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等杂志和高校学报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语气词与语气系统》、《传播语言学》、《现代汉语短语》等各类著作和教材17种。

策划编辑 / 来继文
责任编辑 / 王清珍

汉语通论课程组

课程组组长 张瑞麟

主 编 齐沪扬

编写成员 齐沪扬 陈昌来 任 鹰
姚占龙 朱 敏

主持教师 任 鹰

目 录

引 言 (1)

上编 汉语基础

第一章 语 音 (28)

 第一节 声母和韵母 (29)

 第二节 声调和音节 (56)

第二章 文 字 (85)

第三章 语 汇 (116)

 第一节 语素和词 (117)

 第二节 语汇的构成 (139)

第四章 语 义 (170)

 第一节 词义的性质和词义的变化 (171)

 第二节 多义词、同音词、同义词、反义词 (196)

 第三节 现代汉语中的歧义现象 (227)

第五章 语 法 (242)

 第一节 词的分类 (243)

 第二节 短语和句法成分 (268)

第三节 句型和句类	(297)
第四节 句式及句子的变化	(329)

下编 汉语应用

第六章 汉语修辞	(358)
第七章 汉语的规范化	(389)
第八章 辞书的查检	(416)
第九章 古代诗文的阅读	(442)
后记	(473)

引言

教学要求

教学要求

着重了解汉语和现代汉语学科的构成，了解汉语发展的历史，理解学习汉语知识和汉语应用的意义。

內容提要

现代汉语

一 语言与语言符号

(一)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

1.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会不会说话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说话的目的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类社会有紧密的联系。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有自己的语言，可以说，语言是组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语言不仅是人类交际的工具，而且是各种交际工具中最重要的一种。人类在进行交际的时候，有时也可以不使用语言这个工具，例如用手势招呼别人，用面部表情传达某种信息，这种交际工具使用的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军队可以用旗语发布命令，但这种交际工具表示的意思必须由语言来加以定义。由此可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文字记录语言，打破了语言交际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只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没有语言，社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在文字产生以前，语言就已存在几十万年了，世界上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多得多。马学良主编的《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中曾经说道，我国的少数民族壮族，过去只有语言，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虽然民间在传抄山歌、通信、记账时，曾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过所谓的“方块壮字”，但那只是一种变体汉字，不能成为正式的民族文字。经过对各地壮语方言的调查，20世纪50年代中期，制定了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的壮语作为标准音点的壮文方案，并进行推广。

2. 语言是符号系统

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符号取决于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所谓“能指”（signifiant），是指显示的事物；所谓“所指”（significatum），是指被代表的事物。例如交叉路口的红绿灯，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可以通行”，这个“禁止通行”和“可以通行”就是“所指”，而红绿灯就是“能指”。

现代符号学的奠基者之一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一个两面的心理实体，他

把“概念”称作为“所指”，把“音响形象”称作为“能指”。他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语言符号就是所指和能指的结块。

可见，语言的能指是声音，所指是意义。声音和意义的关系好比纸的正面和反面，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声音的意义，如点头、摇头、微笑等，不是我们所说的语言；没有意义的声音，如咳嗽、风声、雨声等，当然也不是语言。

人类的语言是一个丰富、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包括许多不同特点的单位，单位和单位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有规律可循。例如从语音系统划分出来的单位是音素、音位、音节，从语法系统划分出来的单位是语素、词、短语、句子。就每个具体的语言单位（例如一个词）来说，它的语音形式是依据语音系统的规则构成的，它的意义与词汇系统中的许多方面发生联系，它的功能受语法规律的支配。另外，语言单位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虽然语音单位的声音千差万别，但构成不同的语音的音位通常在 40 个左右。这就是说，不同的语音都是有数的音位按照一定的结构规则生成的。句子是无限的，词是有限的，常用的不过几千。用有限的词按照一定的规则生成句子，也是语言符号系统性的表现。

（二）语言符号的特点

1. 任意性

语言符号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语音表达与意义内容的结合并不依赖于因果关系，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本质的联系，每种语言都是约定俗成的，因而必须承认每次结合都是偶然的，都是使用语言符号的社会自然形成的习惯。同一种事物，每种语言都以不同的声音或文字来表示，这也是各种语言之所以不同的重要原因。如果音义结合不是任意的，而是必然的，人类语言就不会有什么不同了。

赵元任在《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中曾讲过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听说从前有个老太婆，初次跟外国人有点儿接触，她就稀奇得简直不相信。她说：“他们说话真怪，嘎？明明儿是五个人，法国人不管五个叫‘五个’，偏偏要管它叫‘三个’（Cinq）；日本人又管十叫‘九’（ジュー）；明明儿脚上穿的鞋，日本人不管鞋叫‘鞋’，偏偏要管它叫‘裤子’（クツ）；这明明

儿是水，英国人偏偏儿要叫它‘窝头’（Water），法国人偏偏儿叫它‘滴漏’（de-leau），只有咱们中国人好好儿的管它叫‘水’”。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个人使用语言的随意性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符号进入符号系统之后，它就要受到该系统中其他成员的制约，必须按照某一语言的结构体系组成话语，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改变。

2. 线性

所谓线性，是指在交际过程中，语言符号只能一个跟着一个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延伸，决不能在同一时间里说出两个符号来。从理论上说，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用时间的特征：它体现了一个长度，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条直线。线性虽然主要指的是口语的情况，但书面语也是具有线性的特点的，只是有时不如口语那么严格，那么明显罢了。

（三）文字是符号的符号

文字是按照一定方式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辅助语言并且扩大它的作用的工具，是用来代表语言的符号。因此也可以这么说，文字是符号的符号。

文字是书写符号的体系，但书写符号并不一定是文字。我们平时所见的一些指示性的标记符号，只是单个的、孤立的书写符号，不可能进行排列组合，所以它们无法标记语言。只有形成体系的书写符号才能标记复杂的语言体系，文字就是这样一种具有体系的书写符号。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当然也包括能指和所指。文字的能指是书写形式，所指是语言。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文字的所指当然包括声音和意义。拼音文字如此，汉字也如此。认为拼音文字是表音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至少在名称上容易引起误解。拼音文字也好，汉字也好，记录的都包括语音和语义。没有哪种文字专记录语音或语义的。当然，记录的方式有所不同。

文字产生之后，一种语言就会出现两种形态，一种是口语，一种是书面语。口语和书面语并不完全一致，有时还可能出现书面语脱离口语的现象。原因在于口语的物质外壳，诉诸于人们的听觉器官，可以“耳听”；书面语则以字形为媒介，诉诸于人们的视觉器官，可以“目治”。同样，作为一种符号，语言的发展是渐变的，对语言不能进行改革，只能进行规范；文字的发展可以

是渐变的，也可以是突变的，对文字可以进行改革，甚至可以进行创造。

二 汉语和现代汉语

(一) 汉语

1.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语系是根据共同历史来源划分出来的类别，同一语系的语言还可以依据亲疏关系划分出若干语族和语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由于有些少数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因此，中国民族语言约有 80 种以上。这些语言按谱系分类法，分别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和印欧五个语系。其中汉藏语系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文献最丰富的语系之一。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汉藏语系早期曾被称作为“印支语系”。之所以用汉藏语系这个名称，是因为这个语系中的汉语和藏语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使用人口较多，因而用这两种语言的名称来概括与它们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群。

汉藏语系一般认为包括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三个语族。最早提出这个分类法的是李方桂先生，后来，罗常培等先生提出的汉藏语系分类表与李方桂的分类方法大致相同。

汉藏语系的语言主要分布在亚洲各地。其中藏缅语族语言国内使用人口约 1560 多万，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西，国外分布在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和泰国。壮侗语族语言国内使用人口约 1900 多万，分布在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国外分布在泰国、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和印度。苗瑶语族语言国内使用人口约 640 多万，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国外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

2.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发达精密的语言之一，是随着汉民族的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汉语的使用人数约有 10 亿，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

早在 2000 多年以前，中国就开始对汉语进行语文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典籍，这些典籍是世界上最早的语言著作之一。

严格地说，“汉语”可以指任何不同的口语或书面语，如“古代汉语”、“汉语方言”等。但现在越来越多地用来指标准共同语，因为“汉语”能说明种族、文化的实质。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语对东亚、东南亚邻邦的语言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的语言同汉语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些语言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这些国家过去还长期使用过汉字。新加坡还把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该国的通用语言之一。

(二) 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形成

1.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的语言，包括共同语（普通话）和不同的方言。普通话是中国汉族各方言地区和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共同交际用语，是现代汉民族用来交际的语言。同时，现代汉语普通话还是联合国的 6 种工作语言之一，成为一种国际交际语。

现代汉语的方言很复杂，据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语言地图集》所作的归类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几个大方言区。这些方言区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变化不大，但语音方面却各有特点。

(1) 北方方言区。北方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北方话区域包括长江以北地区、长江南岸的九江以东镇江以西沿江地带、湖北（不包括东南角）和湖南西南角，还有四川、云南、贵州以及广西西北部，占汉语地区的 $3/4$ 。使用人口约有 6.6 亿，占汉族总人口的 67% 以上。方言区内部，词汇大同小异，语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语音差异较多，但有规律可循。从哈尔滨到昆明，直线距离约 3200 公里；从南京到酒泉，直线距离约 2000 公里，其间各处的人通话都没有太多的困难。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范围，语言这样一致，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

北方方言区可以分为四个次方言区：A. 华北官话，通行于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北部的徐淮地区，其中东北三省方言最接近北京话。B. 西北官话，通行于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以及青海、宁夏、内蒙古、新疆的一部分

地区。C. 西南官话，通行于湖北省大部分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四省区汉族地区以及湖南、广西两省区的边缘。D. 江淮官话，通行于安徽省长江两岸地区，江苏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长江以南镇江以上、南京以下地区以及江西省沿江地带。

(2) 吴方言区。吴方言也叫江浙话或下江话，以上海话为代表。分布在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地区（不包括镇江），江苏省长江以北海门、启东、靖江以及南通东郊部分地区，浙江大部分地区。使用人口 7000 多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7.2 %。

(3) 湘方言区。湘方言又称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代表。使用人口约 3000 万，占汉族总人口的 3.2 %。湘方言通行于湖南省大部分地区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少数几个县。湘方言可以分为老湘语和新湘语两个方言片，老湘语以双峰话为代表，新湘语受西南官话的影响较大。

(4) 赣方言区。赣方言又称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代表。分布在江西省中部和北部，湖北省东南、福建省西北、安徽省西南以及湖南省东部一带。使用人口 3000 多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3.2 %。

(5) 客家方言区。客家方言也叫客家话，使用人口约 3500 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3.6 %。客家方言是古代北方动乱时人民迁移到南方而形成的方言，以广东省梅县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湖南、四川省的少数地区。广东东部、北部和福建西部、江西南部相连的地方是主要分布地区。客家人居住虽然分散，但客家方言自成体系，内部差别不大。

(6) 闽北方言区。闽北方言分布在福建省东北部闽江下游一带，以福州话为代表。使用人口 800 多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1 % 弱。

(7) 闽南方言区。闽南方言分布在福建省南部，广东省东部的潮州、汕头一带，海南岛和台湾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厦门话为代表。闽南方言的使用人口 4700 多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4.7 %。

(8) 粤方言区。粤方言也叫广东话，以广州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广西、香港、澳门。使用人口 4000 多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4.7 %。

(9) 晋语方言区。晋语以太原话为代表，分布在山西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河北、陕西、内蒙古四省区毗邻山西省的地区。使用人口 4500 多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4.7 %。

(10) 平话方言区。平话分布在广西中部地区，西部的百色、田林等县和

北部的融水、临桂等县。平话内部分歧较大，可以分为两片：柳州以下为桂南平话，以南宁亭子平话为代表；鹿寨以上为桂北平话，至今尚无公认代表。平话的使用人口 200 多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0.21 %。

由于中国人在国外谋生或定居的原因，世界各国逐渐形成很多使用汉语方言的社团。据《现代汉语方言概要》一书统计，粤语社团：约 1500 万 ~ 2000 万人，主要分布在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新几内亚等处；闽语社团：约 1500 万人，主要集中在南洋一带，新兴的台籍闽语社团则在美洲出现；客家话社团：700 多万人，分布很广，如特立尼达、牙买加、毛里求斯、南非、夏威夷等处；官话社团：350 万人，主要分布在毗邻中国内陆的地方。

2. 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形成和普通话的形成

汉族在历史上长期用“文言”作为统一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最初必定是建立在口语的基础上的。例如《诗经》里的“国风”是民间文学的记录整理，《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下来的孔子的言谈，这些都是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的。汉魏以来，写文章的人往往沿袭和模仿先秦的语言，逐渐拉大了与口语的距离，这就是文言。文言学习起来比较困难，能够使用的人又只占全民的一部分，所以，另外一种同口语直接相联系的书面语“白话”就起来同“文言”分庭抗礼。

“白话”最早可见于公元 5 世纪左右南朝产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书中已有若干口语语汇。到了唐、五代的说唱文学“变文”产生后，口语的痕迹就更加明显。同时，当时的禅宗语录，记录了禅师们的问答，都很接近口语。到了 12 世纪、13 世纪，用“白话”写的各种文学体裁非常丰富，诸宫调、南戏、金元杂剧、元散曲中的“白话”成了现代汉民族共同的书面语的来源。元末明初以来大量出现的长篇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虽然都带有各自的地方色彩，但它们都是用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写成的。到了晚清，现代汉民族共同的书面语白话文已经成熟。

元明清三代，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到北京求官的、经商的、赶考的络绎不绝。公用的口语日渐通行，这就是当时所称的“官话”。全国少数民族中也有很多人到了北京，学习汉语，也就是学习北京官话。元朝末年朝鲜人为学习汉语编写的会话手册《老乞大》、《朴通事》，收的都是北京口语，说明外国人也认定北京话是汉语口语的代表。

到了 20 世纪初，特别到了五四时期，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一方面是白话文学作品的广泛流传，一方面是北京口语的深远影响，促进了现代

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正是这一趋势的具体表现。这两个运动互相推动，使书面语接近口语，使口语有了明确的规范，于是形成了通行的普通话。

尽管汉语共同语开始形成的确切年代不好确定，但在汉语的历史上，北方话在汉语中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扬雄《方言》一书记载了周汉以来的许多方言，但也记录了一种“通语”，这就是共同语。到了1234年蒙古人定都大都后，北京话显得尤其重要，元代的杂剧大多是使用大都话。元朝末年成书的《老乞大》、《朴通事》，所反映的大致是宋元以来的北方话，被公认为当时汉语口语的代表，成为现代汉语北方话的雏形。这种口语不久就取得了“官话”的地位。官话通过各种衙门机关逐渐传播到各地去，从四面八方来往于北京和其他城乡之间的各色人等，也加速了官话的传播。但由于经济和交通的落后，当时的许多南方人仍只能“看”和“写”白话，不能说官话。到了清朝，政府颁布法令，“凡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同时出版了推广官话的《正音咀华》，逐渐使官话推向全国。

不过，当时的官话还夹杂着许多别地的口音，不是纯粹的北京话。到了清末，随着经济和救亡运动的发展，文字改革、言文一致、口语统一的要求日益迫切，拼读官话的字母符号也纷纷诞生。1913年，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颁布了“国音汇编”，审定了6500多字的“国音”，统一读音，推行注音字母，正式确定国语的标准音为北京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院在1955年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上确定把汉民族共同语称作普通话，后来又确定了普通话规范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标准。普通话在台湾省和海外有些地方，仍沿用“国语”的名称，在新加坡等则称为“华语”。

(三) 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历史背景

1. 多元性的汉文化的起源

汉语作为汉民族文化的代码，具有深刻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汉语同汉文化是同步形成和发展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至少有四个文化因素对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过重要的影响，多元性的汉文化的起源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原文化时期，夏朝和商朝的建立标志着华夏民族的形成。这个时期，居